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ZHANGKONG LINGXIU FANGLUE

QianNian BianJu Zhong De XianDai ZhiHui

杜语 著

线装书局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ZHANGKONG LINGXIU FANGLUE

QianNian BianJu Zhong De XianDai ZhiHui

杜语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掌控领袖方略：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杜语著.
—北京：线装书局，2015. 6
ISBN 978 - 7 - 5120 - 1833 - 4

I. ①掌… II. ①杜… III. ①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近代 IV. ①K82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984 号

掌控领袖方略——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作 者：杜 语

责任编辑：赵 鹰 孙嘉镇

装帧设计：王文龙 白 晨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010 - 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16

印 张：25

字 数：35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 册

定 价：65. 00 元

序言：

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近现代的领袖方略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有着完整延续的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体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和它传承不绝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所谓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试图去说明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的。此外，悠悠五千年先人创设的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也都在各个方面强化着中华文明的血肉之躯，使中华文明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享有着举世瞩目的盛誉。对此，不仅在中华文明繁盛时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如马可·波罗们是盛赞的，就是随第一个赴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使团运送礼品的总管约翰·巴罗也在他的访华游记——《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承认：“相比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连希腊都不例外，中国更早地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文明。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巴罗不敢肯定“她是否像传教士所说假定的那样一直在进步，仍然可以跟许多现在的欧洲国家相抗衡”。而且他确信：“从16世纪到16世纪末，跟欧洲的一般状况相比，她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不是在科学上，至少在艺术和制造业、在生活的便利和奢华方面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状况跟目前的基本相同，而且可能还将延续下去。”对此，就是当代西方的学者也都是认可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

2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来者羡慕不已。”

但令后人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些昔日辉煌就只能像落日的余晖，给愁云惨雾的东方时空涂抹些令人心碎的金黄，而不能冲破乌云，重新把温暖普照大地的万民之心灵。中华文明造就出来的内圣外王式的东方圣哲和君王也再不能从他们祖先的武库中寻找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武器了，他们只有陷入深深的思考和茫然之中。他们也有过清醒，那就是他们已从血的教训中明白，中华文明已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了，中华帝国更是遇到了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千年以来从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认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康有为则认为是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中华帝国也早已不是令人不敢窥视的天朝上国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武器来拯救他们的国家。不过，此时，他们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协助君权神授的皇上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任务已发生了质变，从治国到救国了。这就是近代和古代的本质不同，这回是遇到了真正的危机，遇到了不是以往古代的传统思想、谋略、方略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摆在了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们面前，他们显然需要新的武器、新的思想、新的谋略和方略来挑战这迎面而来的千年变局。所谓领袖方略，之所以不同于英雄谋略，也是在于其历史前提、条件和历史任务大大不同于以前了。

关于方略，《辞海》的解释是“方策，谋略”。并引《晋书·王濬传》“濬设方略，悉诛弘等”。又引孔戣《谢赐手诏状》“乏御侮之筹谋，罕济时之方略”。而“方策”，《辞海》的解释是与“方册”意义相同，指“典籍”。《辞海》引的原典是《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一句。对此句的解释，则是引的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至于“谋略”，《辞海》的解释是“计谋策略”。所引原典是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评》：“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总之，是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理性成分主导的“方策”，一个是个性化成分主导的“谋略”，是一个涵盖面很大的词汇。清朝的乾隆皇帝尤其喜欢使用方略一词，为了记述、光大其号称“十大武功”的丰功伟绩，还为此成立了隶属于军机处的方略馆。方略馆的职掌就是编纂清廷重大军事行动的始末，但方略馆并不是一个常设的机构，而是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才在得胜后设立。清廷自设方略馆后，前后编纂了十七种方略。编纂方法是“将有关该次战争的奏折、上谕按日汇编”，并详记其原委，其名有时称纪略，有时称方略，如大学士阿桂等修《皇清开国方略》、曹振鏞等纂《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方略馆署名编的《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等。本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但本书认为，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情况，方略一词实际上已成为谋略、方策、策略、战略、政略等一系列词汇的一个总的代表性用语。但这不等于方略可以完全取代以上词汇，以上词汇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还都存在，如谋略是个性化的灵机应变式的；方策是具体的做事方法，个性化较少，固定的计划性较多；策略则是进一步理性化了，但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具体的问题；至于全局性的问题，则需要政略和战略来解决。政略是政治方面的大略，战略是军事方面的大略。

政略和战略都是较少个性化的，更多程序化的、固定化的，一旦制定，就不易变更，这一点和谋略不同，谋略是最变动不居的，而且也是应用面更广的。而在应用范围上，政略专指政治，战略专指军事，后来政略则很少有人使用，一般都使用战略来指代。战略一词因而有所泛化，甚至极大地泛化，除指军事之外，也开始指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甚至技术、心理，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尽管如此，战略这个词的表现力度还是有其特定领域的，战略的特定领域不在于它表述、包含的广阔性，而在于，战略是有强烈的博弈目的性的，而方策、策略、政略、谋略的博弈成分就淡薄一些，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这种智慧既可以用来博弈，也可以是和平主义的、审美

4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的，甚至自娱自乐的，并不一定追求战胜对手的最终目的性。因此，战略在长时间还是比较特指军事方面，并不能完全替代政略一词所表现的内容，若出现要表达既是战略又是政略的内容时，就很难办。这样，方略一词就派上了用场。它被赋予表现更宽、更广、更大、更深、更博的内容的任务，而如此一来，这个词就与普通人无缘了，因为普通人不可能有如此宽、广、深、博的内涵，所以，鉴于这个词如此辉煌，普通人不能用，顺理成章，就自然被皇帝看中，成了御用的词汇，专指皇帝的宏图大略了。

而到了近代，方略一词也沿袭了其在古代所具有的神圣性，也绝非平民百姓所可得而使用。近代中国使用方略一词的一般是领袖级的人物，如孙中山就写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建国方略》等。另外，在古代中国，虽然皇帝偏爱使用方略一词，但方略一词的理性成分还是占据次要地位，个性化的、灵感突现的谋略内涵还是占据主要方面。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客观真理、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益正确、全面、深刻，人们，特别是领袖人物应对各种复杂问题、难题时的理性化、科学化程度也必然就越益提高，甚至会达到马克思所期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二为一的境界。即“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而即使尚未达到如此高远神妙的境界，那在此过程中，个性化、艺术化的谋略成分居于次要地位也是理所当然。此时，方略一词的理性化内涵也必将越益明显地凸显出来，成为名实相副。而古代帝王虽然也使用这个词，但因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较浅，其个性化、盲目化倾向还比较明显，故他们使用这个词就显得名实不副。或者也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

已将这个词汇赋予了新的内涵。

至于领袖一词则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是没有领袖这一概念的。领袖的外语直接对应的是lead，复数形态是leads，现在也有翻译成领导者。在中国近代，还是西方人首先把领袖的桂冠戴在了中国的杰出人物头上的。如1861年，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就称太平天国的天王为“这位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1905年，法国驻华公使吕班（Dubail）也曾把广西会党的首领们称作会党领袖；差不多同时，日本驻孟买领事也把康有为称为“清国改革派领袖”；至于对孙中山，称其为改革党领袖的就更多了。不过名称的改变虽然表示内涵已有所不同，但作为领袖人物把救国的方针、政策、计划以及实施方案称作方略的，还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将方略一词完成从帝王御用到领袖专用的转变也还是从孙中山开始。而在孙中山之前，这个转变虽也一直在进行，但并没有全部完成。

那么，领袖人物的方略又是怎样从古代的英雄谋略中转化而来的呢？要弄明白这一点，还要从近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分析。本书所涉及这个时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衰世，但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时代却正是世界发生着继号称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变革的时代。所谓轴心时代，这是德国哲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 1883—1969）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之所以称轴心，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大约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文明地区都不仅社会历史发生着巨大的革命性的巨变、突变，而且，在这一时期，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也第一次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并为此后两千年的人类思维划定了框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至今没有超出这一框架。但本书认为，如果这一结论是指工业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是合适的，但自从工业革命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自然科学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后，人类就已经实现了第二次伟大的飞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发展的认识提到了科学的高度，而马克思主

6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义的哲学体系，更是在继承了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思想成果，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更高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思想武器，这就更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人类已实现了第二次飞跃。第一次，人类真正实现了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成为人，具有了人的思维模式和高度；而第二次，人类基本上是从人的高度脱离出来，达到了神的高度，因为神就意味着改造自然、创造奇迹，而这些在人类的第一次飞跃时还远远没有达到，此时，人类还是匍匐在神的光芒下，基本上是顺应自然，这时虽也有创造和改造，但都不是化学性的、质变性的，而都是机械性的和物理性的。由此，我还联想到德国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所发出的上帝死了、超人诞生了的呐喊，这说明，人类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已进入到一个超人时代。但当时，大多数人还都是把尼采的呐喊看成是他对超人出现以统治人类的极端期望，而没有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尼采是代表人类本能地、天才地预见到了人类自身已实现了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实现了从人到神的更为巨大的跃升和超越。但超人不是个人，而是正在发生的从人到神的质变的整个人类。因此，自第一次轴心时代以来，人类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在积聚下一次变革或突进的力量，而这下一次无疑就是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人类自第一次轴心时代的伟大变革以来，人类积聚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力量而实现的总爆发。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把西方卷入了这一伟大变革之中，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力量膨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在全球扩展其势力，这就必不可免地把数千年来在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卷入了这一伟大的变革中，西方无疑是这次伟大变革的主动性力量。对此，学术界是有大量研究的。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曾到过中国看过中国清廷档案的美国人费正清就是主张西方是为中国变革提供主要动力的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他的这一套理论被概括为冲击—回应说，并遭到了不少的误解和反对。反对者中最著名的也是西方人，更准确地说，也是美国人，名为柯文。柯文反对费正清这一观

点的代表作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该书中，柯文认为：“其实，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又说：“简而言之，中国在前一个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绝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如果我们把‘回应’理解为有意识地去解决冲击所造成的新问题的话）。”但依本书看，柯文企图补救费正清的观点偏颇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其立论是错误的。首先，柯文把本应是双方共同作用发生的历史概括为中国中心观，而并未真正从中国的民族性格和中国民族文化方面来寻找，并未找到外力冲击和内部回应的中间点，这就使柯文偏向于一端而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倘若有人以为那对立的两条主线，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入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中国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历史是一个过程。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中。静止观念、绝对观念，不可能认识历史。形势、条件变了，历史的面貌结局也就变了。”其次，费正清并未否定中国内部的力量对中国近代历史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力量。他只是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略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只能在西方的冲击下走向现代化。但他

同时也强调“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只是“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付，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概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其中说得最多的仍是中国内部的原因。费正清接着又继续以日本为例，反问说：“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极端看法将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起初西方对中日两国都只产生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外，其滞后也是受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末在华势力大涨之时，中国已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仍然是强调内部。

费正清的错误在于，他在强调中国不思振作，以致出现国家倾覆的厄运时，把责任全归之于中国——实际上此处费正清恰恰是最正宗的中国中心观，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责任则轻描淡写，不愿承认帝国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所造成的灾难。至于他举出的例子日本，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日本其实也只是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个鹰犬，当时中日决战的时候，帝国主义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特别是英国，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三国干涉还辽也不能看作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只能看作帝国主义趁火打劫。帝国主义不能把日本侵略的责任完全从自身抹掉，日本就是代表整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至于为何帝国主义选中了日本而没有选中支持中国，除了中国不思振作，搞了换汤不换药的洋务运动，实力和潜力与日本相比已逐步丧失传统的优势，不能有效遏制北方的沙

俄，从而很好地维护英美的利益外，还有一大原因是中国地大物博，在帝国主义看来是一块大肥肉，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狭小，人口密度相对很大，在帝国主义看来油水不大；而且要征服之还需要耗费远比征服中国所要花费的更为巨大的代价。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已极大地整合了日本的资源，日本已成功地从封建时代走出，甚至已具备成为英美帝国主义鹰犬的条件，自然英美帝国主义不会再把侵略的重点放在日本的身上，而是经过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慎重而详尽的比较，决定选择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再次，柯文强调中国中心观，目的其实和费正清一样，就是不愿承认帝国主义的历史原罪，特别是对东方曾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所犯的原罪。他企图证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灾难并不是，或不全是西方造成的，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于其自身，因此，研究的重点就应当放在中国自身的一边，而不是像费正清那样仅仅从冲击一回应着眼。但很显然，柯文的这一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在西方冲击之前，中国社会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的，西方的冲击并不能完全改变它，但西方的冲击却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它，而最大的改变就是把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且，这一改变，还是近代中国之所以为近代中国的最本质特征。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不能不研究这个主要特征，不能不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个主要特征的研究上，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避重就轻，不是如柯文一样以一种偏向取代另一种偏向，而且其维护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仍不变。

当然，柯文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企图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之外的课题，也有其意义。因为，他觉得帝国主义与中国这样的课题不仅有直接导致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且还是他比较熟悉的课题，他已感觉不能从中获得对中国更深邃的了解，不能满足从中获取历史智慧以应付他的国家自越战受挫后的自省要求以及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需要。这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柯文的错误是把自己的这种需要装扮成纯粹的学术，这就难免会产生误导的负面作用了。不过，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

10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柯文也不断反思，并对自己学说的偏颇有所修正。如他现在已“从起初把历史研究的‘局外性’或‘局外人’立场视为一种认识历史的‘负担’，到肯定其优势和长处，从先前一味淡化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到赞同把中国近代史‘看成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从‘只着眼于小规模地区的地域性和底层社会的特殊性的研究’到认可对‘通论性问题’的考虑，以及从‘中国中心观’走向‘人类中心观’或‘因人为中心的取向’，如此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显示了柯文对激进的后现代立场的警惕和对先前之极端化观点的局部修正”。

所以，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说尽管有简单概括的弊端，但其主要的着眼点还是正确的。本书以掌控领袖方略为题，也必须考虑到这一大的框架。没有西方的冲击，就不会有中国的回应，也不会有中国近代的千年未遇的变局，同样，也不会有近代中国的智慧运用模式的改变，具体说，也就是不会有由传统的英雄谋略模式演变为近代的领袖方略模式。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改变，这一模式的内在目标的锁定才能从以治国为主转化为以救国为主，才能从以英雄人物个体的独领风骚转化为领袖人物的立足于人民大众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才能转化千年变局成为千年契机，一句话，也才能救亡图存。转变的标志性人物是林则徐、魏源，他们的包括“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民心可用”等带有理性、科学性特征的方略体系就蕴含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挑战千年变局的思想要素。

但林则徐和魏源还没有明确提出以方略及实践挑战千年变局的思想，他们的方略及实践还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式的，缺乏长远而宏大的历史视野。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但洋务派领袖们虽然在视野的长远和宏大方面有超越林则徐和魏源的一面，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他们并没有全面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의思想和方略体系中有生命力的内核，而是有继承，也有抛弃。如对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他们是以继承为主，但不

同的是，他们还要“守定条约，决无更改”，这点就是他们对林、魏的抛弃了。此外，他们又提出“自强、求富”，比林、魏在发展经济、军事方面的构想有所进展。张之洞则进一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开始试图超越具体的学习西方的技艺阶段，而发展到努力去解决学习西方过程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了。这点算是对林、魏的发展，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人民群众的力量都严重忽视，这一点就谈不上发展，而是抛弃了。可以说，洋务派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都对林、魏方略中正确的部分有所抛弃。至于左宗棠，也是洋务派的核心成员，他在“自强、求富”上和其他洋务派相同，在镇压农民革命方面和其他洋务派也相同，但和其他洋务派不同的是，他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人民力量的运用，也远较曾国藩、李鸿章等其他洋务派大胆，他最卓越的历史贡献是，在充分发动人民支持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沙皇俄国对我国新疆的领土野心，维护了国家统一，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甚至可以说是林则徐的知己，没有辜负林则徐对他的信任和高度评价。

不过，在洋务派中，左宗棠一派不占主导地位，曾国藩、李鸿章一派从总体上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就使近代中国的国家总体战略方略一直呈现出强烈的对外妥协、甚至投降的特征。因此，在这样的总体战略方略支配下，虽然洋务派做了很大努力，也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决心，但由于大的战略方略不正确，他们并未能很好地达成他们渴望达成的“自强、求富”的目标，也没有充分开拓出近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的最大历史可能性和现实性，甚至还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扼杀了一度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为许多史家所诟病。不过，若历史地看，不仅左宗棠，就是曾、李、张这样虽然不敢抵御西方列强的洋务派，其所开启的洋务运动也在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在封建的堡垒中放置了近代化、现代化的火种，从而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这一基础与当时中国所蕴含的潜力相比微不足道，虽然长时间里洋务派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但其贡献

12 掌控领袖方略

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

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应当给予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只是在我们肯定其历史积极意义的同时，还不能忘记的是，这一贡献所形成的物质基础是需要在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完成之后，经过革命的创造性转化，化腐朽为神奇，才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物质基础，一变而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而在此之前，这一基础还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服务者。所以，历史地看，在这一点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留下的物质遗产，其本质仍然是相同的，当中国的革命成功后，这些物质遗产，都是要作为战利品被人民共和国接收过来的，要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得以为人民谋利的。因此，这些物质基础的被人民利用，其主要的功劳还是应该归功于中国革命，归功于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人民领袖和人民英雄，归功于千千万万的爱国、救国的人民大众，而主要不能归功于洋务派，不能归功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曾、李、张等人也有救国理想和情怀，只是本书深感，当一个人所选择的方略和历史所要求于他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时候，历史是不会根据他们的主观上的某些美好动机、善良的愿望就对他们给予慷慨认可的。历史是一个苛刻的老人，他只对那些在主要方向上发挥了创造性、推进了历史进程的人才给予最大程度的肯定，而那些没有认清历史主要的发展方向的人，没有找到历史进步的最深厚动力的人，尽管也不乏美好动机、善良的愿望，但仍然不得不在历史的既定事实面前，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花环与自己失之交臂。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获得花环的无疑就是那些推动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人民英雄和人民大众。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书中所说：“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

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贫穷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对此，马克思评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的使命时还说道：“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互相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样的道理，曾、李、张等洋务派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发展了一些近代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但那也仅仅是准备了物质的基础而已，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改变这一物质基础的性质，把这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的甜美酒浆转化为被压迫民族也能和先进民族和国家一起共同和平利用的物质财富和成果。

当然，马克思也曾肯定英国资产阶级在亚洲需要“根本革命”以完成人类“自己的使命”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重要意义，但从来没有因此就改变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猛烈抨击，并没有因此就把英国资产阶级看成人类的救世主和英雄，而是一直把这充当了历史不自觉工具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成为强盗。著名历史学者张磊也认为：“中国人民只有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镣铐，彻底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秩序，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把缺乏独立、民主、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不粉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的近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夸大十分微弱的近代工业（甚至不论其社会内涵）的作用，视之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贬低乃至诋毁民主革命运动，完全是谬误的、脱离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论点。”而“把李鸿章捧为近代化事业的‘第一人’，实际是将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混淆不清的结果。他的活动——包括客观上有些积极

作用的洋务基本倾向不是破除而是维护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治中兴’之谓并非毫无缘由”。本书认为，张磊的看法基本把握住了马克思的精神，但也有误解，就是把洋务派完全看成了反动的势力了，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只是认为这种历史作用是通过罪恶和通过社会革命之转化，才能够被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所享用。而且，马克思并也没有指明资产阶级是反动和落后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是认为资产阶级是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的。同样，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也不是落后和反动，而只是进步的程度太小，没有找到一个走向近代化、突破千年变局的正确道路和革命方略，从而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上是有进步中有反动，是带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产生，需要洋务派开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当中国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可宝贵的物质财富，还在发挥着其作为物质基础的先进生产力的作用。

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不同的是，农民阶级的领袖人物洪秀全的救国方略的模式尽管有的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大量谋略形式，但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因而，从其变化和发展的程度上来考察，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与发展已有促使其实现从传统的英雄谋略模式演变为近代的领袖方略模式的显著迹象。首先，他已主要不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寻找理论武器和实现形式，而是从西方盗来了基督教，并天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教，并以此开创了太平天国的伟大事业。其二，他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基本文件，堪称中国农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王朝的两个伟大的宣言和政纲。其开创的传统与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那就是要解决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那几座大山的问题，开始是两座，以后又增加为三座。

到了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都失败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